

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月20日在日本国会的党首辩论中,拒明确承认《波茨坦公告》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定性,招致众多批评。其实在1945年日本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表示投降前后,也有过各种垂死挣扎。

日本投降前曾把苏联当救命稻草

主战派拟定“总决战计划”

1945年7月26日晚,美、中、英三国向日本发出由杜鲁门、蒋介石和丘吉尔签署的《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》。7月27日,日本首相铃木主持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,讨论日本政府对《波茨坦公告》的立场问题。会上,日本外相东乡茂德认为,公告不是“敦促无条件投降的命令”,所以劝日本天皇要以“极其慎重的态度”对待这一通牒。但以陆相阿南惟几、海军上将丰田等为代表的军方人士坚持主张不要公布《波茨坦公告》,如果真要公布,也应附上一项声明,表示坚决反对。铃木屈从了军方。

日本主战派不甘心失败,还拟定了一个“总决战计划”,共分3个阶段。以第三阶段“日本、满洲、朝鲜的整个毁灭阶段”为例,共分三个步骤:“(一)全力保卫东京,以自杀战术普遍阻抗盟军的前进,但日本必将因此遭受美机的滥炸,因此,日本的整个岛屿建筑亦将全部毁灭,战至东京沦陷后,立即向盟国提出无条件投降,本土战事至此可告一段落。(二)东三省与朝鲜现有日军约100师团以上。在东京宣告投降以后,朝鲜与华北等地日军必须继续作战,必须战至全部覆没为止。(三)如东三省与朝鲜两地为盟军攻占,日军全部毁灭后,日本本土定可利用盟国间互相之矛盾而存在。”其狠毒残忍可见一斑。

寄希望于苏联居中调停

事实上,日本主战派“总决战计划”都是假想苏联不至于参战而拟的。东乡茂德坚持不要从正面拒绝《波茨坦

公告》,也是想静观苏联的动向再作定夺——由于苏联与日本签订有中立和平条约,苏联当时没有在《波茨坦公告》上签字,也没有对日本宣战。

进入8月份,形势对日本越来越不利。8月8日,东乡茂德给驻苏联大使佐藤发去电报,称“局势急转直下,必须尽快澄清苏联的态度。请再作努力,并急复告”。佐藤当即联系苏联外长莫洛托夫,试图做最后的努力。莫洛托夫在下午5时约见了佐藤,但并没有谈论苏联出面调停之事,而是向佐藤宣读了苏联对日本的宣战书——斯大林8月7日已签署命令,要求苏联远东红军做好准备,于9日零时开始进攻。

莫洛托夫念完宣战书后,佐藤立即追问道:“所谓自8月9日进入战争状态的时间,那就意味着8月8日是和平状态,自9日起为战争状态吗?”“是这样的。”莫洛托夫说。

由于日本大使馆电话线被切断,佐藤的电报也发不出去,所以直到8月9日凌晨,日本才得知苏联已向日本开战。苏联参战,加之美国于8月6日、8月9日连续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,对于同盟国的双管齐下,8月9日,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,讨论是战还是降的问题。最后,天皇作出决断:结束战争。

与美国私下讲好投降的“价钱”

在我们的印象中,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然而在日本的官方材料中,别说“无条件投降”,连“战败”“投降”之类的字眼都没出现

过,日本只使用“终战”表述。

日本《产经新闻》去年刊登消息,称在英国国立档案馆发现1945年日本驻都柏林领事向日本外务省发出电报的副本,主要信息是告知“美英已同意日本在战后维持天皇制的要求”。这份电报印证了一个流传已久的猜测:当年美英私下与日本讲好了投降的“价钱”。

美国当时对战胜国日本的处置,与德国相比实在有着天壤之别。日本不仅没有被勒令改变原有的政府结构,很多最重要的战犯未受追究,拆除可供军事所用的重工业、对受害国赔偿等也被美国一笔勾销。日本天皇在8月15日宣读“终战诏书”时,投降被称为“为保全国体停止战斗”,措辞和行文毫无“无条件投降”的意味。更有甚者,9月2日日本正式签订投降文书时,在由美方准备的投降文书中,也没有“日本无条件投降”字样,只要求日本武装力量缴械投降。

原来,在战争即将结束的那段时间,美、日驻瑞士的代表一直保持着频繁接触。德国投降次日,即5月9日,日本天皇就得到驻瑞士秘密使团的报告,说美方代表允在“无条件投降”的名义下,可为日本提供包括“保留天皇制”在内的“照顾”。而接到这一消息后,日本并未立即应允,仍希望借助苏联的调停,将“投降”改为“体面和平”。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,日本这才接受了美方的“开价”。可以说,69年前那场不彻底的无条件投降,为今天的日本右翼歪曲历史提供了温床和逻辑起点。

(据《百年潮》、《齐鲁晚报》)

日军战俘回国 被视为中共使者



1956年6月21日,中国政府宣布对在押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免于起诉,并准许他们获释回国。然而,这些战俘满心欢喜地回国,遭遇的却是被抛弃的下场,生活困顿。

这些老兵们回国后,当日本警方为迟归的军人奉上“大日本帝国”时代的军服和军靴时,他们大吃一惊,旋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:拒绝接受。

3天后,日本政府计划发放的撤侨津贴也因为老兵们的激烈抗议而临时升为2万日元/人,但这远不足以补偿11年被战争荒废的青春。他们需要更公正的战争赔偿,需要日本政府更为妥善的安置。登陆的第二天,老兵们发表《告日本国民书》,这些被抛弃的战犯回国者还很快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“中国归还者联合会”(简称“中归联”),向日本政府申请战争赔偿和战后生活救济、津贴,但日本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善意,回应寥寥。

其后的生存景况可想而知。据1959年日本政府公布的调查结果,当年全国平均家庭收入为3.2万日元,而“中归联”会员在1960年的平均收入仅为2.4万日元。

因为在苏联和中国11年的改造经历,他们被视为异类,在试图营建自己生活的时候,也受到了不少的干扰。警察时常会来进行所谓的思想状况调查,还会要求他们提供关于苏联和中国的信息。一些归国战犯在公司里、在社会上也会被莫名其妙地贴上“赤色分子”“过激分子”“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使者”的标签,不仅得不到政府的照料,甚至因此被警察跟踪、监视,而被剥夺了人权。

老兵岛村三郎在《中国归来的战犯》一书的后记中写道:“我们刚回国的时候,报纸、杂志的大量篇幅中出现了‘洗脑’这个新词汇,对我们的自我改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。”

曾在中国东北鹤岗煤矿工作的松本千代男,现居千叶县,战败回国后,经熟人介绍,接受了一家大型钢铁公司的就业考试。在获得了内部录用正要上班的时候,公司不告知他任何理由就取消了他的录用资格。

(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)

八路军改编的曲折历程



蔡元培绝食逼蒋

西安事变之后,整整7个月过去了,可是,对于国共联合抗日,蒋介石仍难下决心。毛泽东决定借助民主人士的力量,敦促蒋介石联合抗日。

毛泽东写下一大摞信,发送给马叙伦、蔡元培、马相伯等70余人。

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,读到毛泽东的信后,赶赴南京面见蒋介石,要求国民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意见,接受红军改编,国共共同抗敌。

陈布雷想方设法把蔡元培劝出来,蔡元培气愤地说:“我绝食静待,以死相报。”整整3天,蔡元培滴水未进。

蒋介石只得再次会见蔡元培,并答应蔡元培马上召开国防会议。蔡元培得到了蒋介石的应允,这才告辞。

冯玉祥攻心说蒋

可是,蒋介石的国防会议迟迟不开。此时,南京危在旦夕,每天都有十几架日军飞机在南京上空狂轰滥炸。这天,冯玉祥风风火火地闯进总统府请求辞职。蒋介石说:“你有所不知。共产党精明得很,他们以抗日为口号,实际上,却想得到政府的承认,得到政府的经费,好名正言顺地扩大自己的实力。”冯玉祥说:“红军只编3个师,仅有国军的1/60。再说,你可以一下把他们送到最前线,然后,再给他们划一个防地范围,不让他们越雷池一步不就行了。”蒋介石听了这话,想想倒也是个办法,说:“好,就依你的话,同意他们改编。”冯玉祥见蒋介石表了态,又怕他反复无常,马上请求立即召见周恩来,与他谈妥此事,蒋介石最终同意了。

把败军番号给八路军

蒋介石召来了军政部长何应钦。“我问你,收编红军,准备给予3个

师的番号。这3个师之上又给什么名义,划归哪个战区,防区划多大地盘,等等,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蒋介石发话了。

何应钦说:“整编桂系时,空着一个第八路军的番号,就授给红军算了;至于师的番号嘛,东北军打了败仗,被撤销了一些师级番号,后来整编时又空出许多番号。我看就用115师、120师、129师这3个番号。让他们用这些失败的番号,也算是一个暗示吧。再将他们划归阎锡山的第二战区。具体地盘嘛,干脆指定为太原以北、大同以东的晋察一带,这里是日本人近期进攻的主要目标。红军死于日军的铁蹄之下,也算是为国捐躯了。”蒋介石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8月18日,蒋介石召见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,表示“同意将红军收编为国民革命军”。

周恩来虽不满蒋用“收编”一词,但蒋终于明确表了态,所以,他也就没再去苛求字眼。就这样,八路军诞生了,下设115师、120师、129师。

(据《老年生活报》)